

全球化下風險社會之政治實踐

周桂田

1 前言

當代市民社會的本質有莫大的改變，基本上必須架構在全球化風險社會的形式下重新思考，因此，我們將從全球化風險社會的角度，來瞭解討論當代市民社會的政治實踐問題。風險社會 — 作為當代市民社會的現實面，挑戰既有工業社會的認知、發展基礎與典範，並企圖從此種舊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所衍生的災難風險、自危及性(self-danger)建構社會自我翻轉、變遷的動能。當代工業社會除了帶來了人類發展的進步便利性，但也同時產生了對人類健康、生態、環境、倫理、社會、性別、弱勢族群等生存威脅的風險，亦即，其所產生「自作自受的不安全性」(self-made uncertainty)風險，令今日市民社會中存在巨大的生活、政治疑慮；然而，這樣的自作自受的生存威脅，在現實上也逐漸逼迫市民社會的公民（社會或個人）進行自我改造、修正。在政治學的意義上，反身性行動(reflexivity)(Beck 1994;1996a)（註一）為當代市民社會政治實踐的出發點，其涵蓋個人、社會與國家三者之政治內涵。

本文將從這個角度，闡析當代風險社會紀元(Risikoepoche)政治實踐的意義，首先討論風險社會政治實踐的理論意涵；其次，回歸並借用社會學傳統下「結構」與「行動」架構，特別是引用紀登斯(Anthony Giddens 1979)「結構化歷程」觀點，分析風險結構與風險（政治）行動互為辯證、影響的發展，而形成「風險結構化歷程」的實踐建構（周桂田 1998b）。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必須探討當代風險結構的主要面向，之後方才討論，反身性行動如何透過其「行動」意涵，尤其指涉到個人、社會與國家三個層面在風險社會下政治角色、地位及政治運動的變更，來進行其存在於、捲入於、實踐於與撼動風險結構的另一波文明化歷程，而風險文明化(Risikoivilisation)(Beck 1993a)正則是從「第一現代」（工業現代）推移到「第二現代」（反身性現代）的發展樣態。

2 風險社會之政治實踐

風險社會的政治秩序觀基本上脫離了傳統的、工業社會的政治秩序範疇及社會連帶關係。傳統政治秩序之理念型大抵不脫離社會契約論的內涵，以盧梭的總意志(general will)到霍布斯的巨靈論(Levithan)，皆強調個人意志自律，並將管理統治眾人權利讓渡給國家；而洛克的契約說更強調財產權與政治秩序公平正義的

重要關係。此種強調人類理性(rationality)、進步(progress)及政治代議(political representative)之啟蒙運動社會、政治秩序觀，在工業—技術(革命)的文明化中卻一再的被狹隘化約，以致在近代現代化過程中呈現一味盲目追求進步發展，而罔視環境、生態、人文破壞的「工業國家」、專家代議權力高漲或壟斷之科技官僚「全能國家」、以及喪失民主參與精神的「資產階級」社會(Beck 1993; Latour 1995)。貝克指出，它們所形成的基本上是潛藏式的「資本主義進步信仰」(Kapitalistische Fortschrittsglauben)，其**政治精神或共識往往將科技進步等同於社會進步、而人文生態負面效果或災難則當為科技變遷必然的社會結果**，此等政治精神不但鑲嵌在現代國家政治決策機制中，更成為社會發展的秩序常態(註二)。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分工複雜的分化，涂爾幹有機連帶的觀點也可以被解說於此種侵略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參與資本主義的勞動，變成現代人社會分工與社會整合的連帶要件。但事實上，資本主義的排他性也涵蓋勞動機制的分配，就業(鉗入)(Inklusion)和失業(排除)(Exklusion)卻變為現代人加入或整合入社會認同與連帶的重要基礎(Leisering 1997)，換句話說，工業資本主義的政治秩序隱含有強大的排他性格，失業者、老人、弱勢者(女人或原住民)及外國人經常是政治秩序整合排除的對象，也是政治秩序的動亂之源。涂爾幹有機連帶的個人理性意志原則，在此被分解為鉗入／排除的命運，也呈現了當代工業社會秩序排他與侵略的不可反逆演化。

而當工業災難和高科技風險撼動平穩假像的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原本工業國家、大有為政府、政治冷漠的資產階級社會及其社會連帶整合之納入／排他機制等秩序基礎，皆面臨崩潰。尤其災難和風險常逾越原先政治、經濟、社會或科技系統的邊界(Systemgrenz)，風險的責任變得無限擴大，科技衍生的生態災難往往源自於政治決策，也與經濟系統介入脫離不了關係，而最後承受的社會系統卻在未發揮民主參與監督權利，變成結構共犯的受害者。風險的責任歸屬一旦模糊化並無法在現行政治機制與秩序獲得回應，用貝克(Beck 1986)的話說，簡單的工業現代化(Einfache industrielle Modernisierung)之政治、社會機制並無法因應風險的衝擊，則將產生「**政治內爆**」(Politische Explosion)：一切政治皆須重整。換個角度來看，由於風險的範圍與責任歸屬過大，不但巨觀的資本主義、民主代議體制、環境制度、勞動體制到微觀的個人認同、生存抉擇或人際網路，皆涉足風險而成為必須重新建立新秩序的對象。當代(現代性)所面臨的風險是無所不在，風險侵入各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環境、宗教、族群等領域，這些由原先「線性理性」(Lineare Rationalität)思維所發展出的工業現代化問題，本身卻無法由「工業現代」(Industrielle Moderne)的機制來解決。更另詭的是，工業現代社會中在理念上強加區分政治系統、經濟系統、科學系統、資產階級式的(市民)社會系統，或過份強調系統理性(Systemrationalität)的「自我再製」(Autopoiesis)(Luhmann 1986)功能，卻往往無視或忽略現實上問題本身的關聯密

度，並由於系統間之交疊區域(Zone)過大，使區分系統變得毫無意義(註三)，以新興宗教為例，其不單僅涉及宗教系統事務，而新興宗教（如飛碟會）經常是對政治、經濟變遷、環境、治安或兩岸軍事對峙等問題或風險而衍生出的社會行動；而對高科技風險的恐慌不僅涉及生態系統的自我再製，同時，其關聯到科學認知、文化心理、政治決策控制能力、控制信心、經濟介入操縱、失業恐慌、認同恐慌等，事實上是各系統相互滲透、侵入他者的再製(other-poesis)，系統彷彿變為空殼子，無單一的內涵。因此，前述貝克之政治內爆的觀點，在筆者上述的思考演繹下可以延伸為「系統內爆」(Systemexplosion)，政治內爆的勁力衝潰工業現代的系統邊界及內涵，造致系統內部秩序動盪，系統也內爆而一片血肉模糊，成為幽魂無所不在的系統。

以上述的角度來解讀將風險社會當為是政治化的社會，則異常有趣。在這一點上貝克繼受蓋倫(Arnold Gehlen 1996)之日常生活公共政治實踐(vita activa)的觀點，從災難風險的立場強調對現行政治的再政治化(Politik des Politischen)，應揚棄工業主義的現代而進入到實踐無所不在的「政治現代」(Politische Moderne)，這也是其一九九三書標題所主打的「政治的再發明」(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Beck 1993a; 1993b)意義，一切政治在風險社會下皆需重新洗牌、再創造、再發明。而其中的行動者及行動方式則不假他人，從微細的、多元的日常生活領域到社會的、分歧的公眾事務，皆由風險承受者（其實已經是每個公民、團體、社會）「反身的」參與、決定、永續發展，一切皆是政治，政治變成個體或團體自我直接對峙、解決風險的過程，打破了傳統政治國家、菁英、科技官僚統治與操弄的疆界，也越過了龐大官僚化制度的冷冰精神。風險社會蘊生的因此是「反身的政治」(Reflexive Politik)(Beck 1993c)之實踐過程。

3 全球化下風險社會之結構

如果我們歸納綜合風險社會幾個關鍵性的結構因素，大概可以以高科技社會與生態破壞、個人主義化(Individualisierung)及全球化危機等三個面向來彰顯問題的嚴重性。這三個風險結構並非各自獨立、偶連性(Kontingent)發生的，而是在工業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的過程中，傾向進步開發主義、擴張主義、個體主義及市場自由主義等的發展結果。因此，結構的動能即源自於工業—科技—市場優先的思維，決定了風險的結構（風險來自於「決定」(Entscheidung)）(Beck 1986; Luhmann 1990)，也為風險結構相互辯證、依存的屬性推向難以反逆的文明化路向，除非，政治內爆成功的鬆動其基本的發展思維主軸。

3.1 高科技風險

高科技發展的本質原先就是使知識／社會的分化越趨複雜性。知識的分工越來越細密，致使專業的藩離之牆愈來愈高，更不利於知識間的整合；而科技帶動社會分化的領域與速度也日益龐雜迅速，往往無奈的打破人們（性別、族群）社會分工認知的基礎和行動的認同範疇。這些知識／社會分化、分工／認同迷失的例子，用盧曼的話來說，就是衍生「風險意識」(Risikobewußtsein)的基礎(Luhmann 1995)。因為，當社會系統自我分化的複雜性，如脫疆野馬般的不斷發展，不但使得人們無法透視社會的整體，掌握社會秩序的意義，更往往超出人類的負荷，而形成社會演化的危機 (Halfmann 1996；周桂田 1998a)。

更甚的是，當此種演化乃以工業－科技主義為優先(a priori)，整個演化所遞生的風險結構便成了專家暴力統治意義下的複雜性危機，在專業複雜性與社會功能複雜分化背後，明顯的隱藏有著「老大哥」統治的機制，從「知識就是權力」到「權力就是知識」(Latour 語)，老大哥夾著工業進步、經濟發展的威力睥睨於世，而將工業－科技進步強行等同於社會進步或純化為現代文明的開展，事實上是將社會推向演化死亡的路向。

同時，工業－科技主義支配主軸的高科技社會，也扭曲科技與社會的關係，科技成為工具理性思考下的產物，去中性化的科技與科學思維明顯的加深了與社會溝通的鴻溝。科學知識與科技應用成了「專家」的禁鬻，專家成了「門外漢」(layman)的指導者、訓育者與規劃者，專業知識為唯一決定的標竿，而專家與門外漢的落差被視為無需民主的正當性過程。以當前炙手可熱的生物科技為例，當基因工程知識及其應用（如無性生殖、基因改造活生物體、基因改造動植物(GMO)）仍具高度風險爭議性，其卻往往在「進步」的假設及商業邏輯力下，毫無設防的推廣到社會應用領域，而專業的科學家面對社會批判質疑之聲，卻經常以權威者姿態來訓育他人，儼然是生命權力(Biopower)的規劃主宰者(Foucault 1996)。

基因科技也和核能科技同時並列為高科技對生態造成破壞風險的例子，以前述基因改造微生物體或農作物為例，其在未通過數年嚴格的田間實驗及管制時，若任意釋放入自然界，所造成的生態災難是目前科學所無法估量和補救。換句話說，高科技風險已逾越了傳統科技的控制範疇，其具有不可計算性、不可控制性和損害無法復原補償性的內涵(Beck 1986;1993a)。特別是，以目前全球政經發展的趨勢，高科技所涉及的生態風險也不再是侷限於地域的、主權國家內的，而是透過自由貿易、買賣、境外移轉、生態擴散（也諸如高科技工業廢料（如汞污染、核廢料）、臭氧層等），對生態的威脅已成為全球化的風險(Giddens 1994)。

在上述全球生態風險結構的面向下，高科技知識與應用的本質，就值得再檢討，尤其風險涉及決定，高科技的發展勢必衡估社會民主的面向，以民主決策為

最後風險承受與轉轍的根據（註四）。

3.2 當代市民之風險個人化

風險結構的另一個面向為貝克所提出「個人化風險」，其一方面包括前述生態的風險直接威脅個人的生存，也就是當代人類所面臨的社會不平等，不再僅是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財富分配邏輯上的不平等，而是在全球生態災難下的風險分配邏輯的不平等(Beck 1986)，其涉及的不但是跨國的、亦是區域的不平等，例如富有國家將高污染、高危險性工業輸出到落後貧窮國家，致使其人民必須承受重高的災難風險。

另一方面，風險個人化涉及了社會認同及結構性失業。在知識與社會快速複雜分化所陡生的風險意識，特別是如社群主義者瓦齊爾(Michael Walzer)所提出的四個流動範疇下（即職業流動、教育流動、空間流動及離婚率提高），常造成社會行動者脫離原先的社群或連帶的團體，也弱化了其行動的自明性（Beck 1986），因此在失傳統社群網絡與行動基礎的狀況下，個人的社會認同往往受到挑戰，以紀登斯的話來說，就是個人失去原先社會基礎的「信賴」(trust)，而在「籍入」社會的過程，尤其是籍入高度複雜的高科技社會中產生了危機。

在現實上，夾全球化擴散之能的工業－科技資本主義所造致的全球結構性失業，正是風險個人化之新社會不平等的最佳寫照(Beck 1997)。傳統上，失去勞動位置就失去人在社會中獲得他人肯認(Anerkennung)的能力(Taylor 1993)，而在目前的社會安全制度上，卻因為因無法加入勞動市場而同時意謂著無法加入勞動保險，而等於被社會所排除(Exklusion)。結構性失業之風險常波及於個人的地方，是因為「奔向無工作之資本主義」(Kapitalismus ohne Arbeit)越演越烈，在德國有百分之十的人長期成為失業者，有百分之十五的人隨著皆可能成為下一個勞動失業者(Beck 1997)，而這個趨勢也正發生於其他工業國家。

綜合來說，認同風險分別與生態風險個人化及失業風險個人化有關。對高科技的不信任與陌生恐慌，以及直接相關個人生存命運的失業影響著人們行動和認同的熟悉性和基礎。

3.3 全球化風險之動態結構

全球化風險是一個綜合命題，全球生態風險與全球性失業結構並非個別的單因，其和工業－科技資本主義之經濟全球化面向有密切的關聯。貝克將此定義為以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全球主義」(Globalismus)，其在全球化的動態

過程中，雖瓦解了主權國家的舊有權限和能力，但卻促成了在人類的文明史上之生態、勞動、社會安全與民主體制的重大危機(Beck 1996a; 1997)。生態問題不但分為窮國、富國，也在新自由資本貿易主義推波助瀾下從地域發展到全球，前述基因科技為一例。而在「世界性的風險社會」(World risk society)中，窮國所造致的災難污染由於其制度及監督的不健全，往往要到問題相當嚴重並擴散出去才被發覺(Beck 1996a)，這皆是拜資本主義之賜，因為當地政府乃一味追求一方式的經濟成長模型。

資本外移、自由流通乃體現自由貿易主義的精髓，但隨著資本家外移投資、尋求勞動、土地、環境成本低制管制國家，對主權國家形成嚴重挑戰：一方面國家喪失企業對國內的回饋或稅收的支持，侵蝕著社會國安全制度的支柱，另一方面結構性失業又促使社會福利成本的提高，也威脅著社會整體的安全秩序，也就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安全和民主聯盟的歷史性斷裂」(Beck 1997)。

在這樣的批判觀點下，以下我嘗試分析所提出的三個全球化風險動態面向：

在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的現實操作上，資本的流動基本上集中於全世界三個主要地區，即北美、西歐與以日本為首的東亞等國家(Castells 1998: 113)，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地區無論是自由競爭所發展出的資本累積與流通、工業與商業佈局發展，或由國家所主導的發展策略，基本上相當重視知識/科學(技)的應用、創新與研發(記住前述柯司特主張獲利力與競爭力乃當前企業推動知識/科學(技)創新應用與擴張全球市場的現實)，並企圖透過生產技術與科技層級的區隔，將其發展之優勢擴散於全球市場，雖然國家與自由企業在地理疆域的佈局策略不同，甚至相互矛盾¹，但其發展的屬性通常鼓勵了大型的資本累積，鼓勵技術、市場的發展與擴張以提升競爭的優勢，而連帶的也促因企業為了維持其全球的競爭能力，或降低生產成本，或以生產點擴張其海外市場，在一定階段「出走」其資本或生產系統。

上述的背景無論是全球高科技資本主義或國家高科技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向，皆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全球競爭市場支配、全球社會結構性失業與社會安全體制的問題、最後也是最棘手的是在資本與高科技結合下所形成的全球生態風險或災難(包括環境生態與人文生態上的侵入與工具化過程)，亦即，這些面向的風險是隨著資本、科技、市場在全球各地盤繞的程度而動態性的糾結(entangled)在一起，並相互關連，其呈現的雖可能是地區問題，但也可能迅速的擴及到全球。

¹ 國家乃鼓勵國內外企業的資本與生產投資，以帶動國內經濟發展的永續性，因此，對企業與經濟資本的自由移動，通常會加以設限，然而，經濟資本自由移動的特性乃以利益為導向，管制的成效基本上相當有限，也因此，資本的全球移動，對各國政府產生了不小的政治與社會安全壓力。

讓我們從圖一的最後面看起，精確的說，全球高科技資本主義所構成的全球化風險包括了（一）原本因生產科技或技術的區隔導致的全球垂直分工效應，因知識/科學的研發應用競爭、海外生產點與市場拓增壓力，使得垂直分工的地區流動性（包括國內或國外）速度增加，企業者通常考慮生產成本或市場營運成本，而遷移其生產據點，而造成全球結構性失業問題。一開始是由先進工業國內部，逐而拓展至發展中國家，生產點的進駐與遷移往往不是考慮當地社會的需求，大部分皆以市場與利潤為依據。這種投資資本的移動與控制，大都仍存在於前述三大區域，因而造成了「無工作之資本主義」現象(Beck 1997b)；（二）趨於激烈化的高科技資本主義，無論由企業或各國政府推動，主要目標為佔領全球市場優勢，但由於以知識/科學（技）為基礎的經濟生產與競爭的本質，在於最大資本的累積運用、最優先的技術突破（只有第一名而沒有第二名）、以致唯一的在某個期限內全球市場佔有（如威而剛），因此，容易形成跨國企業因資本與技術研發（在全球某些跨國企業每年投資在商品技術之創新研發應用上之資本，還勝於某些國家一年所計畫補助的研究發展經費²）、全球市場通路的相對優勢，而實質上壟斷全球某些商品市場；（三）這樣的發展一方面導出了新科技殖民主義的幽靈，再次的拉大全球原本不平等的區域或國家間的發展，使得已發展工業國與發展中工業國進入了高科技資本主義更加劇烈的落差和不平等，傳統上南北衝突的問題勢必更形嚴重；（四）另一方面可預見的是在各領域的商品，因優勢科技的落差，夾雜「先進」意識型態，而形成強勢性商品或文化的侵入，如資訊傳播技術的發展優勢對全球電影工業好萊塢化的推波助瀾。這些發展現象與因素推向結構性的全球化風險，一步一步的逼近了全球市場由主要科技國、跨國企業所支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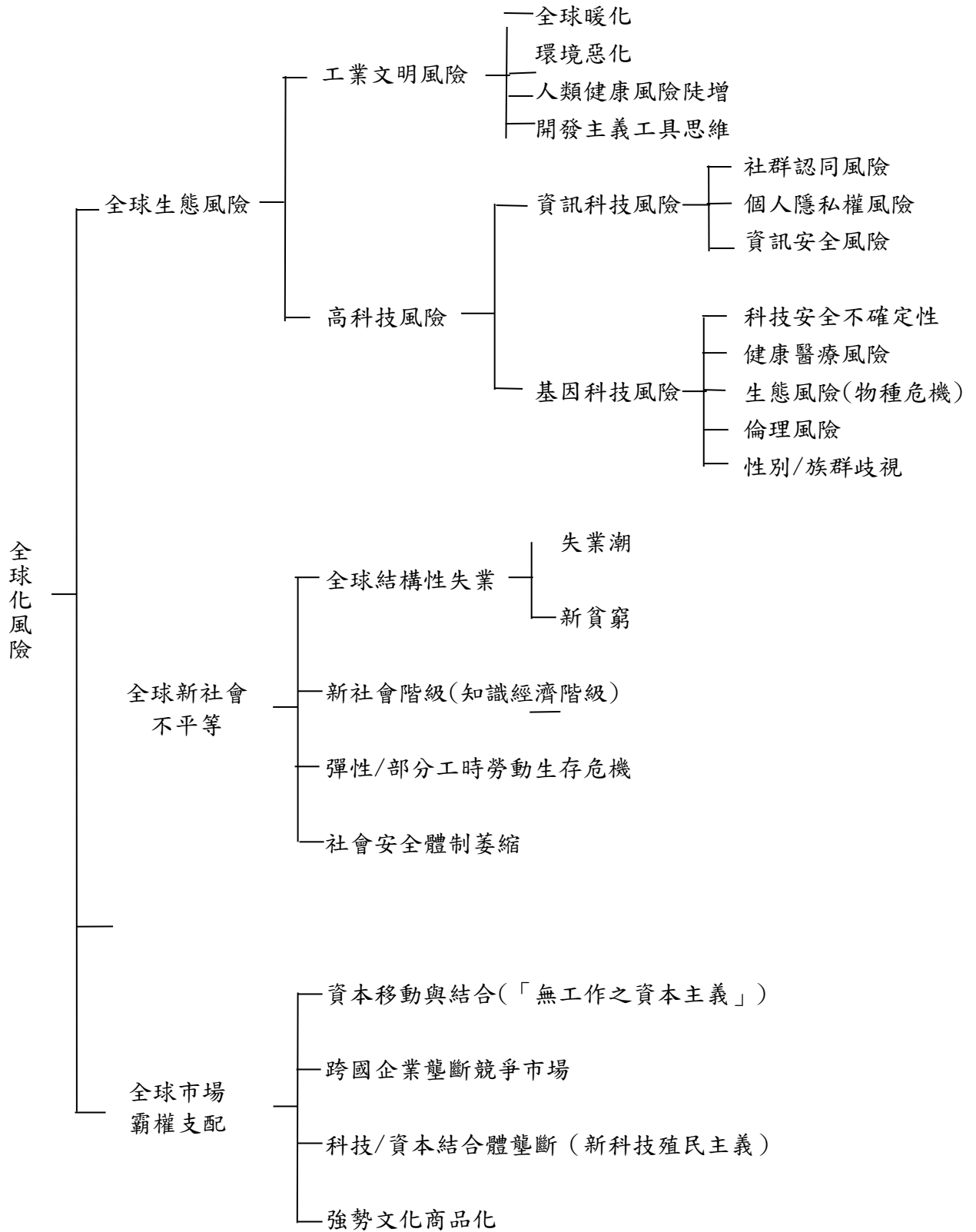
全球高科技資本主義的侵入與發展，一方面拉大了國家與國家之間發展的差距，同時也在各國內部形成新的社會不平等風險，亦即，無論是已開發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由於新興的知識/科技/資本組合體的全球競爭、生產之流動屬性，造成無論是白領或勞動階級的結構性失業，而帶來各國目前嚴重的失業潮危機，甚至某些地區企業員工為求自保與互助，寧願降低每週工時與薪資，調整勞動力與企業勞動成本，以保障彼此的基本工作機會，而不會被排除於社會之外（例如德國的Volkswagen員工自一九九〇年末，即自行契約縮短為每日半天工作時間，以因應失業潮的危機。）；而無論是縮短部分工時或失業人口，皆引發了新一波的貧窮或相對貧窮的威脅。同時，全球性的失業潮或新貧窮也帶來了各國社會整合與安全上的問題，如台灣學童因家長失業無法付出營養午餐費用，甚至影響到教育的延續性³，而越來越多的失業人口，使得社會秩序、治安更形複雜，國家亦因企業的外移而短收稅收，面臨更多失業給付的數額而顯得捉襟見肘。亦即，高科技資本主義所蘊含的工具化思維、動態的發展邏輯，侵入了全球性的、在地性的、個人性的社會不平等發展，造成個別個人的生存、整體國家、或甚至全球的

² 參閱周桂田(2000)有關全球生物科技工業發展的討論。

³ 聯合報 2002/09/07 七億元優先補助營養午餐，第九版。

社會安全體制威脅，而社會安全體制的存續與穩定正是當代資本主義與工業社會

圖一：



重要的基石或副產品，一旦無法正常運作，則將危及民主社會體制與社會認同 (Beck 1997b)。另一個可能發展的，為高科技資本主義下所產生的階級新貴，所謂的知識經濟階級或科技新貴，添加了貧富差距、社會階級屬性不平等的基本問題。

構成圖一全球化風險最上方之全球生態風險，涵蓋了兩組討論，其一為工業文明風險，其二為高科技風險，二者在這邊必須以全球化發展的層次來理解。前者為對工業社會破壞自然生態之延續批判，但在這個地方則強調當代對知識/科學（技）的深化應用，更朝工具理性/開發主義的思維與實踐方向發展，透過利潤與競爭策略所達到擴張全球生產點與全球市場佈局等之高科技資本主義的推波助瀾，知識/科學（技）優勢支配的工業發展進一步的極化了具全球動態意義的環境、生態危機，亦即，其風險的擴散範圍已超越既有國土疆界、局部地域、發展出全球性質的問題，如全球暖化、全球氣候變遷異常、生物多樣性危機、全球水資源污染危機、全球疫病（人與動物）傳染危機（包括口蹄疫或狂牛症之全球擴散）等。這些問題並非一蹴可幾，但由舊工業社會延續性的發展到今日高科技工業社會，一再的激化進而擴散其全球效應，因此，我們應可視之為新一波全球化過程所產生的工業文明風險。

另一面向所提出的高科技風險，主要要凸顯高科技與資本主義動態的纏繞結合，如何侵入了人類之社會與自然（生態）領域，這裡暫且以資訊科技和基因科技為例檢討。資訊科技雖帶來全球資訊化經濟、生產、組織、運輸與傳播溝通的進步，但在工具化思維下，有導致解構社會認同、侵入個人隱私與資訊安全等問題，而如後者一旦與全球商業競爭利潤導向結合，則後果難以估計，例如個人醫療資訊因商業競爭利益而不當的被侵入，甚至加以應用（如大藥廠對個別基因資訊的應用研發，以發展藥品市場獲目前我國健保IC卡對隱私權的侵犯爭議⁴）。而基因科技所引發全球化的風險，則顯見在主要國家的高科技發展之競爭過程，除了國家與企業資本不斷大量的投入，全球市場的競爭機制也逼迫各國對此種仍處高度爭議（科技安全、生態安全、健康安全、倫理與社會爭議）之基因工程，包括基因改造動植物、基因醫療、基因製藥等，做出鬆綁管制的措施，以佔取全球生物科技經濟之競爭優勢。此種發展趨勢表面上雖然呈現人類對科技主義發展兩難的反省，但實際上卻在國際政治經濟競爭與喊價中（如牽涉基因改造活體越境安全的「生物安全議定書」(bio-safety protocol)，在國際的政治經濟角力上，到目前無法真正履行。），將全球帶向相當高度的發展風險，涵蓋了生態、健康、倫理、社會階層與族群等衝擊，而其之間的風險不但是全球性的，更在全球化過程中（經濟、運輸、市場交易等），相互的關連與影響。

⁴ 中華日報 2002/11/08 健保局：IC卡資料不可能外洩，立委質疑國人隱私可能遭大陸竊取，第五版。

上述三個全球化風險的發生，並非當代突發現象，其基本上與人類歷史上生產政治與生產技術的演變有關，而此種驅動人類文明演變的最大關鍵則來自於工業革命後的延續發展，至當代演繹成以知識/科學（技）為基礎的高科技-工業-資本主義的結合體，並且，這些風險不斷的依循此種發展、工具性的邏輯，動態的、反覆的、互相影響的被建構於全球各國、各地或各民族之中。重要的是，它們除了不停的呈現全球風險的再製，也在全球化發展的過程，和在地社會相互糾結，辯證的形成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結果。簡單的說，全世界各地不斷複製、發展的工具理性思維，不斷的翻騰全球在地化更延伸、更棘手的風險問題。

4 當代市民社會（風險社會）之政治實踐

在全球化面向下之高科技風險與生態危機、結構性失業、社會安全制度危機及社會認同等風險個人化問題，譜成出的風險結構內涵，遠遠的逾越工業社會政治系統所能承受的範圍。一方面工業社會政治系統是經濟系統的代理人，遵奉經濟成長優先的信條，更篤信科技萬能的神話；另一方面開發主義的貫徹卻是以主權國家大有為政府(Vorsorgestaat)為實踐主體。而這些卻無法在全球化的風險社會中繼續執行下去，政治內爆的衝力不但從災難風險崩潰了工業現代化的價值，也解構了國家、社會和個人的關係。

從全球化的角度，主權國家的能力是被削弱了(Albrow 1996)，而事實上在世界風險社會中，主權國家不祇是能力被削弱的問題，而更重要的是國家的性質被迫（反身的）改變，國家不再是霍布斯式巨靈的角色，在風險社會中國家被迫和社會及個人的關係重組，社會、個人被迫（反身的）承擔、參與、決定政治，以通過風險時代來臨之考驗。進一步說，這是政治哲學的革命，也意謂著風險社會必須展開和工業社會時代迥然不同的政治契約說，社會契約中部份社會或個人的權力勢必要拿回來。

面對國家、社會和個人政治關係的重構，涉及的必然是權力和行動的問題，特別在德國批判理論的傳統下，溝通與社會建構是一體的兩面，將風險當為是開放性的溝通建構過程或溝通的政治過程，則相當重要（顧忠華 1998）。溝通論述另一方面是權力和行動的展現，誰能參與論述、論述的範圍、位置（立場）皆代表溝通權力的內涵(Foucault 1996)，因此，風險社會下國家、社會、個人皆面臨權力和行動取向的溝通建構問題(Hajer 1995)。

4.1 風險管理政府

國家(State)，在風險社會時代並擴及全球化過程之危機中，已無法再扮演預防性 (Vorsorge; provident)的角色(Beck 1994)。全能國家的萎縮反映在(全球)重大環境災難、科技高度風險威脅、結構性失業及鬆解中的社會安全制度危機等風險結構中，代表主權國家實質內涵的科技官僚、專家政治宣告失能(impotent)，其傳統政治或專業上對社會或災變的預測、控制、復原能力及手段已回天乏術。這也代表中央集權式的國家面對瓦解，國家在面對那些高度爭議的社會風險或發展，很少能再一意孤行，因為隨著風險界限模糊與風險責任無限大的高度危機，它之所有政治責任為不可承受之重，不僅要面對社會內的挑戰，也必須衡估國際間的壓力。

因此，國家最佳的策略為扮演風險管理者的角色，亦即，在反身性政治意義中國家無能概括承受所有全球化的風險責任，因而分散風險責任，將風險的決定取諸於社會或國際之間；主權／獨裁式的科技官僚統治不但造成政府決策機制處理風險的恣意危險，也違反民主原則。

風險管理是指國家採取開放性的溝通態度，降低政府機器的權力位置為經營管理、協調者角色，重視社會不同利益、團體的聲音，尤其當代社會職能分工相當細密，國家除重大政治原則與方向外，應充分尊重社會內多元的、不同立場團體的意見，特別是政策決定應建立長期溝通協調的機制，化解爭議獲取最大的共識(Konsens)。而風險責任的分散化，也建築在國家尊重公民社會論述的權力和行動基礎上，以高科技風險為例，國家應擺脫恣意的成長政策與集權領導方式，透過協調的機制將風險問題開放給社會領域並形成公共論壇，由公民社會中的團體代表共同參與與決定政策(Beck 1993a)，一方面使人們在公共領域的討論過程，更清楚的掌握問題的風險本質，另一方面善用公民社會資源，將決策的基礎擴散到社會共識的過程，以社會理性能接受風險的程度為政策依據，降低風險(複雜性)對社會的衝擊，否則不輕率通過高度爭議的事務。

尤其，在全球化風險的時代，任何問題動輒牽涉國際間的關係，重視風險管理的政府不但能考慮到國際組織間的協調機制，更能善用公民社會所連繫全球的NPO/NGO 網絡力量，使得決策機制納入更廣的民主基礎，更能釐清風險問題目前世界各國接受的程度，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比較態度來形成政策的內涵，同時亦可藉此民主基礎抗壓大國對主權國家政府的無理要求。

而對經濟全球化造成的結構性失業危機，國家則應更重視公民社會(如工會、福利團體)的意見，以社會的民主基礎來協調、解決資本外移的問題，以降低社會安全的風險。

4.2 由下往上之政治(Subpolitik)

風險社會中政治內爆除了國家喪失其統合的能力，另外就是個人被迫覺醒(reflexiv)進行自力救濟，由個人行動團結形成公民社會力量，對抗全球化風險結構：生態、失業、社群認同危機。政治內爆炸碎了全能政府的藩籬，暴露了個體在世存有(Dasein)之「本體上的不安全感」(Giddens 1990)，越來越多人（主婦、消費者、生態運動者、工人、學生等）加入政治進行自我權利、命運的保衛。貝克描述此種直接面對危機起而行動的反身性政治，為揚棄傳統制度僵化、權力操弄政治的好時機，為政治進行再創造、再發行的理想過程，而此他稱為「次政治」(Subpolitik)(Beck 1993)。

次政治為直接政治(Direkte Politik)，由下往上(Von Unten nach oben)的政治實踐，工業國家時代家長式的政府經營在一波波全球災難風險中宣告失能，而個人意識覺醒，面對風險後之自我行動、自我組織(Selbstorganisation)的政治過程則成為現行政治的主軸，自我政治(Selbstpolitik)所意涵的是人們進行自身對風險問題的認識、參與和決策，並團結為公民社會團體(Beck 1997)。因此，次政治不僅僅再指涉工業社會中的傳統公民運動團體，而更包括了直接承受風險命運的「個人」(Individuen)，由更廣的、更直接的全球個人行動（全球次政治(Globale Subpolitik)(Beck 1996a)來撼動風險結構的轉形。

事實上，次政治的理念推演著當代公民社會力量與基礎的擴張，個人已不滿傳統資產階級市民社會(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形態，社會不祇是消費、生產的領域，相對的，社會乃是政府之外最重要的公共、政治領域(Forst 1994)。而此充滿政治性格的公民社會，在風險的年代最具意義的是和個人行動銜接起來，以個人的參與、溝通來實踐哈伯瑪斯式論述的公民社會(Habermas 1994)。

也就是說，風險是開放溝通建構的結果，個人經由學習論述權力的實踐，在社會內凝聚共同的論述經驗和內涵，形成開放的、修正的、實踐倫理式的「風險理性」(Risikorationalität)，而此種批判式的、溝通（理性）倫理式的風險理性，正是揚棄工業時代線性目的理性的最佳政治，由個人實踐到社會實踐，論述權力和行動的建構，也成為個人行動之最佳利器。

風險文明化事實上呈現著國家、社會和個人政治解組和再造的過程，而其中的現實是個人在歷史上雖不是第一次成為風險的承受者，但在當代全球生態、失業、認同等危機下卻第一次成為風險個人化之直接承受和行動者，以個人的政治實踐來轉轍風險結構化的可能。

(註一): 有關風險社會之現象學上人類生存的描述, 如「自作自受的不安全性」意義, 涉及了當代人類「永續」的生存如何可能的思考, 特別是其理論上顛覆現行工業社會秩序, 企圖另外蘊生新的社會秩序, 並且是以「風險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的命題」來進行發問。請參考周桂田 1998b。

(註二): 延伸啟蒙運動以來的工業社會秩序不再是「如何可能」的問題, 而是已經成為「宰制性的秩序」, 對立於此, 例外思考風險社會秩序如何可能也具有相當的挑戰性, Wehling 就批評 Beck 所謂的「反身性現代化」觀, 仍含有以人類理性為中心的啟蒙運動陰影, 請參考 Wehling 1992。

註三: Beck 對 Luhmann 社會系統觀所形成的風險責任認定問題經常是持批判的態度, Beck 認為系統之說將使得問題僅歸諸於系統的生產出了差錯, 而個人則「自由自在」, 毫無個人行動責任可言。以環境問題為例, 當台北市民拒用(不習慣)市府即將執行的垃圾帶政策, 到底是(政治)系統出了問題, 或是市政府/個人行動的規範/自我規範出了問題? 以系統論而言, 當台北市民皆「決定」拒絕配合此政策時, 到底誰是 Luhmann 定義下的「風險」或「危險」的承擔者。可參考 Beck 1986; 1993。

註四: 尤其高科技風險影響的層面相當大, 從民主建制的觀點來看, 高科技政策決定應符合「科技公民權」理念, 以透明機制來緩衝社會風險。請參考 Frankenfeld 1992。

參考文獻:

周桂田 1998a, 「風險社會」中結構與行動的轉撤, 台大社會學刊。

周桂田 1998b, 現代性與風險社會, 台灣社會學刊。

顧忠華 1999, 風險、社會與倫理,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Albrow, Martin. 1996, *The global Age, Polity*.

Beck, Ulrich. 1986,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n andere Moderne*. Suhrkamp.

Beck, Ulrich., 1988, *Gegengifte - Die organisierte Unverantwortlichkeit*, Suhrkamp.

Beck, Ulrich. 1991, *Politik in der Risikogesellschaft*, Suhrkamp.

Beck, Ulrich. 1993a, *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Zu einer Theorie reflexiver Modernisierung*. Suhrkamp.

Beck, Ulrich. 1993b, *Risikogesellschaft und Vorsorgestaat - Zwischenbilanz einer*

- Diskussion, in: F Ewald, 1993, Der Vorsorgestaat, Suhrkamp, S.535-58.
- Beck, Ulrich., 1993c, Politische Wissenstheorie der Risikogesellschaft, in: Bechmann, G (Hg.), 1993, Risiko und Gesellschaft, Westdeutscher Verlag.
- Beck, U. & Beck-Gernsheim, E. (Hg.), 1994, Riskante Freiheiten, Suhrkamp.
- Beck, Ulrich. 1996a, Weltrisikogesellschaft und Weltbürgergesellschaft, Manuskript erscheint im Sonderheft der KZfSS „Umweltsoziologie“.
- Beck, Ulrich., 1996b, “Kapitalismus ohne Arbeit”, in: Der Spiegel, Nr.20/1996. S. 140-146.
- Beck, Ulrich., 1997, Was ist Globalisierung, Suhrkamp.
- Beck, U. & Sopp, P. (Hg.), 1997, Individualisierung und Integration - Neue Konfliktlinien und neuer Integrationsmodus?
- Durkheim, Emile., 1984.,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tr.by Halls, London: Macmillan.
- Frankenfeld, Philip J., 1992, Technological Citizenship: A Normative Framework for Risk Studies ,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 Vol. 17, No. 4, pp. 459-84.
- Forst, Rainer, 1994, Zivilgesellschaft und deliberative Demokratie, in ders: Kontext der Gerechtigkeit - Politische Philosophie jenseits von Liberalismus und Kommunitarismus, Suhrkamp.
- Foucault, Michel., 1976, Mikrophysik der Macht, Merve Verlag Berlin.
- Foucault, Michel., 1991, Die Ordnung des Diskurses, Fischer Wissenschaft.
- Giddens, Anthony.,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London.
-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l.
- Habermas, Jürgen., 1992, Drei normative Modelle der Demokratie: Zum Begriff deliberativer Politik, in: Münkler,H.(Hg), Die Chancen der Freiheit. Grundprobleme der Demokratie, München: Piper Verlag, S.11-24.
- Halfmann, Jost., 1996, Die gesellschaftliche „Natur“ der Technik -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soziologische Theorie der Technik, Leske + Budrich, Opladen 1996.
- Hajer, Maarten A., 1995,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Latour, Bruno. 1995, Wir sind nie modern gewesen - Versuch einer symmetrischen Anthropologie, Akademie Verlag, Berlin.
- Leisering, Lutz., 1997, Individualisierung und “sekundäre Institutionen” - der Sozialstaat als Voraussetzung des modernen Individuums, in: Beck, U. & Sopp, P. (Hg.), 1997, Individualisierung und Integration - Neue Konfliktlinien und neuer Integrationsmodus?
- Luhmann, Niklas. 1984 Soziale Systeme - Grundriß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Suhrkamp.

Luhmann, Niklas. 1990, Risiko und Gefahr, in: ders.,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5, Opladen.

Taylor, Charles., 1994, Quellen des Selbst. Die Entstehung der neuzeitlichen Identität, Suhrkamp.